

论韩愈传记文学的生命力与艺术美

饶 德 江

在韩愈的丰富散文著述中,哪些作品应该归入传记文学的范畴呢?我认为,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以历史人物或当代人物的生平为主线,具有真实性和较强的文学性。据此,韩愈创作的“序”、“传”,如《张中丞传后序》、《太学生何蕃传》等,以及他的大量优秀的碑志,如《柳子厚墓志铭》、《曹成王碑》、《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等等,都应该视为传记文学。

过去,人们囿于“谀墓”的观点,往往轻视或否定韩愈的碑志。诚然,由于碑志属歌颂死者的体例,且韩愈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本身的局限,其碑志中确有一些“谀墓”之文,但“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常把丰富多样的文学现象绝对化、简单化,从历史和文学的角度综合考察,他的大部分碑志都不宜得出否定的结论。

刘勰《谏碑》篇说:“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铭则辞”。碑文历叙传主家世,概括描写其生平重大事件,显然属于传记作品。韩愈及后起的古文家,相当着重致力于碑志等传记文的写作,并且在理论上有自己的标准。韩愈《欧阳生哀辞题后》说:“古之道不苟誉毁于人,”强调自己载人记事的基本原则;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论述碑志应史笔和文心相结合,成为后代“义法论”的先声;顾炎武《日知录》说:“志状在文章家为史之流,上之史官,传之后人,为史之本,”着重指出志状的史料性。韩愈的碑志符合上述原则么?我认为,《旧唐书》中柳宗元、孔戣、李皋等二十余人的传记,与韩愈碑志所载大体相符,即是说,韩愈现存的七十五篇碑志中,约有三分之一为《旧唐书》采用。《新唐书》也大量采用韩愈的碑志。我初步翻检了一下,《新唐书》在《旧唐书》的基础上,根据韩愈的传记作品,新增石洪、李观、樊宗师等人的八篇传记,新增张巡临刑,孔戣禁止受贿,张彻痛骂叛军等九十余事。韩愈的创作态度严肃,传主基本上是作者的亲朋挚友或同时代的人,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和文学性,故史书乐于采用。这说明笼统指斥韩愈“谀墓”,缺乏事实根据。

韩愈是擅长为文的著名文学家,他的优秀碑志不但真实可信,而且人物性格鲜明,富有生命力和艺术美。因此,将其称为传记文学是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般顺理成章。韩愈传记文学的生命力和艺术美,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随事赋形,各肖其人。传记贵在写出人物的个性,而个性则需用具体事件来显现,故作者的立意和取材异常重要。韩愈善于根据传主的个性特征和事迹的大小多少来确立传记的中心,采用不同的笔墨来写活主人公。当时的良将名臣,由于事迹较多,他往往围绕一个主题精心选材,铺陈直述。《曹成王碑》的传主李皋是位享盛名的大将,碑文为了突出李皋的“忠”和“将才”,依次记他忠于朝廷,平定叛军,反对藩镇等事,特别详写讨伐李希烈的经

过，在具体叙述各次战役后说：“大小之战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县，民老幼妇女不惊，市买不变，田之果谷下无一迹。”这段话既有战功赫赫的概述，又有民众的反映，还有军纪严肃的特写镜头，表现出李皋坚决平叛，善于作战，严于治军的个性特征，李皋的“忠”和“将才”跃然纸上。韦丹的写法也颇有特点。《新唐书》将韦丹列入《循吏传》，政绩非常显著，可记的事甚多。韩愈在碑志中紧扣“为民”主旨，按事迹大小施用笔墨，详略得体，就事直书，成功地写活了这位“凡为民去害兴利若嗜欲”^①的良吏。何焯评说：“初读此，似无奇，后观杜牧《遗爱碑》，仅存一空壳，仍服其叙致之精赡也。”^②匠心独运，叙致精赡，貌似平淡，而功力深厚，是这类传记的显著特色。

对于事迹不多的传主，韩愈则根据其个性特征的主导方面，选择某些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浓墨渲染。如王适是一位不得志的下层知识分子，怀才不遇，以奇人著称。志传突出一个“奇”字，写他“怀奇负气，不肯随人后举选”^③，应朝廷直言试，对语惊人等奇事，特别详写他与媒婆合谋骗婚的奇举：侯翁立志将女嫁官人，王适“即谩谓媒姬：‘吾明经及第，且选，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姬谢’。诸许白翁。翁曰：‘诚官人邪？取文书来。’君计穷吐实，姬曰：‘无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见未必取眎。幸而听我’。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与王氏。”^④这段著名的记述，有人物的精采对话和具体动作，有事件的开端发展，突出了王适的奇崛疏狂之态，写出了媒姬的贪财狡猾和侯翁忠厚受骗，读后令人颇难相信这是立在死者墓前的碑文，却象传奇小说中的优秀片段。此外，张彻、孔戣的义士形象，柳宗元、孟郊的文人特色，韩愈均能把握其主要方面，在志传中鲜活淋漓地加以表现。陶宗仪说：“碑文惟韩公最高，每碑行文言道，人人殊面，首尾决不再行蹈袭。”^⑤传记作品并非公式雷同，千人一面，而能围绕特定的艺术聚光点选材行文，做到“人人殊面”，这是韩愈随事赋形，各肖其貌的高明之处。

第二，捕捉差异，凸现个性。人的个性有勇壮、怯懦、豪放、含蓄、刚直忠厚、狡猾凶残等等区别，传记善于捕捉种种差异，才能凸现血肉鲜明的传主个性。前人评论《史记》：“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有廉颇面目，樊哙有樊哙面目。同叙刺客，豫让之与专诸，聂政之与荆轲，才出一语，乃觉口气各不同。”^⑥《史记》的这种宝贵艺术经验，对韩愈显然有开路的启迪作用。韩愈在捕捉差异，凸现个性方面，也取得了不容低估的成就。首先，在传写性格和经历相近的人物时，他能把握每个人精神面貌的不同之处，舍同存异，重笔勾勒传主的独特个性。例如柳宗元和樊宗师，都是韩愈的好友，都以作品名震当代，都属文人之列。韩愈写柳，重点是才学惊人，品格高尚，穷而越工，文必传世；写樊，重点则是不从流俗，独立特行，辞必已出，勇于创新。这样，柳和樊就能截然区分，使人产生不同的鲜明印象。再如写诗人孟郊和卢殷，两人都怀才不遇，处境悲辛，结局凄凉，但叙述时却很注意其差别。孟诗个性鲜明：“剔目铄心，刃迎缕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⑦这样一位诗人却官职卑微，死后只能靠亲朋埋葬。卢诗“可录传者在纸凡千余篇，”^⑧但他仅任县尉，最后“竟饥寒死登封。”^⑨通过描写两人诗才、遭遇和结局的具体差异，孟、卢的个性就在相似中显示了不同。其他如奇人王适与薛公达各有奇特之处，良吏韦丹与王仲舒的宽仁爱民各有特色，义士张彻与孔戣的忠直刚烈各有不同表现，不少优秀传记都表明韩愈描写同类人物时捕捉差异的高超艺术。

其次，韩愈还善于把个性迥异的人物安排在同一环境和事件中，通过激烈的矛盾冲突，在对比中写出强烈差异，动态表现人物个性。《张中丞传后序》记南霁云突围求援，贺兰“不肯出师相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

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同样是面对睢阳危在旦夕的形势，贺兰拥重兵却不相救，反而妄图收买“勇且壮”的南霁云，南则在酒宴上慷慨陈辞，断指明志。写贺兰的野心，写酒宴上的不同态度，更能对比凸现南霁云刚烈忠贞，以身许国的鲜明个性。再如有关李邕的描写。此人刚直不阿，志传写他任南郑令时，“尹家奴以书抵县请事。公走府，出其书投之尹前。尹惭其庭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且曰：‘令退’。”^⑩当众投书使矛盾激化，府尹恼羞成怒的狼狈态，反衬出李邕不徇私情，刚直耿介的个性特征。

第三，以少总多，传达人情。传记作品贵在通过形象来激发和强化读者的有关感情。万取一收，以少总多，是挖掘人物心灵世界，传达其丰富感情的审美原则。《左传》宣公十二年，晋师被楚击败，逃跑过河时，“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这是宏大战争中败兵神态的细部特写。文公元年，楚成王被逼上吊，“湓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这是表现人物特殊心态的传神之笔。《史记》塑造人物的细节比《左传》更为丰富，也往往更典型。诸如鸿门宴上各类人物的动作、语言和神态的描绘，廉颇、蔺相如产生冲突和矛盾激化的渲染，韩信忍辱胯下，张汤儿时审鼠，李斯少时见厕鼠和仓鼠而感叹等等的白描，都是令读者叹赏称道的。

韩愈得《左传》、《史记》之神韵，在以少总多、运用细节方面相当有独创性。首先，他善于万取一收，精选最能表达和传达人物感情的细节，作到颊上添毫，精光四溢，使传主富于立体感。《张中丞传后序》写南霁云断指明志，“血淋漓以示贺兰”。这一具有悲壮色彩的细节描写，传达出南霁云刚烈忠直，满腔义愤的炽热感情。这与鸿门宴上樊哙“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和蔺相如在秦庭“怒发上冲冠”的写法相比，颇能收到异曲同工、各尽其妙的艺术效果。再如志传记张彻临刑痛骂叛军：“汝何敢反！前日吴元济斩东市，昨日李斯道斩于军中，同恶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矮狗鼠鸱鸢。汝何敢反，汝何敢反！”^⑪详写传主在特殊环境的话语，三用“汝何敢反”加强语气和情感，淋漓尽致地渲泄他热爱祖国，仇视叛乱的情怀。这样，就把张彻视死如归、正气浩然的义士形象凸现在读者眼前了。

其次，韩愈选用的某些细节还具有心理描写的特征，能够一以当十地展示传主的心灵世界。当然，他的传记没有西洋式的大段心态描绘，也没有《红楼梦》那样的精细心理刻画，而是靠简洁含蓄、凝炼传神的语言来作到这点的。例如《张府君墓志铭》写张季友谨言慎行，韩愈并没有举出大量事件来罗列说明，而是截取日常生活中富于个性特征的细部表现，写他“与人语，恐伤之，而时巍巍有立。”张与人言谈时的心理活动和神态举止是如此，其它时候的谨慎表现就自然更可想而知了。短短十二字，既写出传主的心理特征，又给读者留下联想和再创造的广阔艺术空间，真可谓传神妙笔。另外，李皋擅自开仓济民时的心理活动，薛戎不愿诬陷别人时的深切感叹，也是以少总多，写得相当成功的。

二

从谋篇、情节、细节等方面来分析作品，固然是鉴赏评论中的重要环节，也能在不同程度上把握作品的生命力和艺术美，但如果仅此止步，则大多会停留于作品的表层具象而忽略其深层意象。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说：“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文学借助于语言文字，按照一定的艺术方法和写作技巧创造出形象，而形象则表达和传达出作者的情感意念。所以，“言”、“象”、“意”这三者有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由“言”

而生的“象”构成作品的表层具象，作者所表达和传达的“意”成为作品的深层意象。作品的表层具象和深层意象不是简单相加，不是机械排列，不是各自为阵，而是互相渗透、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所谓文学是情感的符号，是意味的形式，是有生命活力的有机整体等说法，都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作品的具象与意象之间的辩证关系；所谓“得意忘象”、“气韵生动”、“情在辞外”、“象中之象”等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作品内在的生命力和艺术美，强调了作品的深层意象。因此，探讨韩愈传记文的生命力和艺术美，既需要分析其表层具象，更需要体味其深层意象。

从宏观上综合考察，韩愈的优秀传记文不但具有严整精美的表层具象，而且具有耐人回味的深层意象。其深层意象脱胎于韩愈的文化心理结构，而韩愈的文化心理结构又是历史积淀、文化环境、社会思潮以及韩愈的经历素养和个性气质等诸多因素交互作用、动态形成的结晶品。正因为如此，韩愈传记的深层意象呈网络式结构，包含、潜隐、奔涌、迸射着生命力和艺术美。大概而言，韩愈传记的深层意象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其一是情浓意挚的人道精神。韩愈历来以明道、卫道者著称。他自己在《送陈秀才彤序》中说：“学以为道，文以为理耳。”又在《欧阳生哀辞题后》中说：“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也。”他所谓的“道”、“古道”，具有多方面的丰富复杂的内涵，此处不遑细论，而情浓意挚的人道精神，则显然是其中极为重要的核心组成因素。

众所周知，我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原始氏族社会的遗风习俗并未很快消失，而是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文明中被长期大量地保留。阶级对抗、共存关系和血缘氏族宗法关系的交互作用，在农业型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形成了我国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原始氏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质朴、真诚、互助、互爱的人道精神，在儒、道、墨诸家学说中都形态不同地得到保留。儒家一方面宣扬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和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另一方面又主张“仁爱”，提倡“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道家在激烈批判文明社会伴生的种种罪恶现象时，常常流露着对氏族社会的平等自由的记忆和向往；墨家奉行无等差的“兼爱”，“爱人若爱其身”，也与氏族社会的原始人道精神一脉相承。由于历史演变过程中长期的意识、情感的积淀作用，由于我国特有的长达数千年的农业型文明，原始人道精神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我国传统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也成为韩愈传记作品的重大母题。

韩愈立足于现实生活，遵循和张扬“古道”，将自身满腔的浓情挚意凝聚晶化为文学语言和文学形象，体现于传记人物的行动事迹和言谈话语之中。他对“凡为民去害兴利若嗜欲”者的歌颂，对杀身成仁、反对叛乱、为国捐躯者的赞美，对高风亮节，在污浊社会中刚直不阿者的推许，对贫贱不移，在艰难困苦中保持人格尊严者的敬重，都是一往情深地从不同角度充分肯定。他那些优秀传记的深层意象，交融、汇合、翻腾、奔涌着人道精神的滔滔巨浪，冲击和震撼着历代读者的心灵。昔者往往喜用长江大河、天风海雨、惊雷闪电等雄奇壮伟的景物来形容韩文给人的印象，且大多从形式、结构、语言等方面探求其奥秘。我认为，韩愈散文，特别是他的传记作品，之所以具有如此磅礴的气势和力度，固然与形式、结构、语言密切相关，同时也更与作者那浓烈、炽热、深厚、真挚的人道精神血肉相连。

其二是不平则鸣的忧患意识。这是与人道精神并生的情感化意念。在台湾和香港很有影响的徐复观提出忧患意识的观念，认为儒学的兴起，是对中华民族从殷商以来所建构的文明、文化的内在肯定，体现为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促使人们对人进行全面的反思。^⑩我认为这一观念有相当道理。值得补充的是道家、墨家等学派的兴起，也是相反相成，从不

同角度体现着人的自觉，体现着同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既是中华民族哲学心态的重大特征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审美心态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诗经》、《楚辞》、《史记》和杜甫、韩愈等文豪的不朽篇章中，我们不难体会和感受到这种忧患意识撞击心灵的强大力量。

韩愈传记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深沉反思和不平则鸣的情感化意象之中。在藩镇割据、战祸连绵、内忧外患苦难深重的中唐时期，韩愈的坎坷经历和儒道互补的文化心理结构，使他对社会中的种种不平现象有切身体会和深刻认识。面对忧患弥漫的严峻现实，他不能不思索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能不大声疾呼，创作出大量优秀传记。由于忧患意识的强大内驱力，他为挚友柳宗元一人就写了三篇传记作品，从不同角度为柳作不平之鸣。在《柳子厚墓志铭》中，他记下柳与刘禹锡改换流放地一事忍不住说：“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这段形象而又深刻的著名论说，借题发挥，激宕沈郁，悼叹无穷，不仅是对柳的赞美和对世俗的抨击，也是对人格美丑的剖析，是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反思。在千载之后的今天，读者不也会由此联想到现实与人生么？

博大深厚的忧患意识，常使我国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先天下之忧，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以平治天下为己任，“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孟子，在污浊世俗中维护人格尊严，为理想而九死不悔的屈原，通古今之变，立一家之言“舒其愤”的司马迁，“窃比稷与契”，“此志常觊豁”的杜甫，都是在高扬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中，表现出肩负人世苦难、清除社会丑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伟大的优秀的传统。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敢于谏迎佛骨而险遭杀害、不惜生命单骑出使镇州的韩愈，其传记作品同样体现着上述传统。在《答崔立之书》中，他表达了自己的志向：“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他对人的自觉、全面的反思，他那爱憎鲜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不少传主的忧患经历得到了表达和传达。

其三是悲壮奇伟的悲剧风格。“尚奇伟”的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中认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文学艺术常以激发人的悲哀为特征和极致，这是塑造人类情感的一种方法或模式。韩愈的见解和创作实践，特别是他那些显示出壮美的悲剧风格的传记，印证了这一审美和创作的规律。

刘熙载《艺概·文概》说：“太史公文，韩得其雄。”两人的优秀传记都具有悲剧风格，皆属于壮美范畴，故可称为“雄”。然而，他们又常常同中有异，各具特色。首先，司马迁的审美眼光，大多注视着历史上那些叱咤风云、名震千古的大英雄大豪杰，而对同时代的人物则着墨不多。韩愈传记中的人物，却大多是与同时代或时代很近的英雄志士。在他那长长的人物画廊中，张巡、南霁云等职位低微的将官，王适、薛公达等怀才不遇的奇人，柳宗元、孟郊等备尝艰辛的文士，均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表明他所倾心的壮美包含着较多的现实因素。

其次，司马迁记述的悲剧性人物如项羽、陈涉、伍子胥、商鞅、李广等等，着墨最多的是他们的行动和事迹，他们奋发有为的豪迈气质，他们追求功业或坚守某些信念的舍死忘生。这些人很多死得壮烈不凡，有重要价值，使读者感到悲剧中突出的是壮美，是无畏进取的榜样，是道德满足的欢欣。司马迁通过这些人物表现了强烈宏伟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理想，代表了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强大的审美思潮。

韩愈笔下的悲剧人物，大多不如司马迁所写的那样声威赫赫、名震千古。他们不是在惊

天动地的大事件中显示出悲壮，而是表现于贤者屈居下位，才能遭受摧残，正义无法伸张，理想被现实扼杀的不平遭遇中。如柳宗元、薛公达、王适、卢贻、孟郊、卢殷等人，经历和结局都相当悲凉。但是，他们或发愤著述，立言不朽；或高风亮节，垂名后世；或捍卫正义，受人仰慕。他们的悲剧都程度不同地显示出英雄气概。由于时移世变，韩愈的雄豪在某些方面失去了司马迁那种宏伟气魄，但他的悲剧人物植根于现实，更贴近社会底层，更接近普通人的忧患艰辛，是在平凡中显示出奇伟，所以同样能激活读者的有关情感，使人们思索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这层意义上，韩愈与司马迁的传记的悲剧风格，可以说是同中有异，各得其妙。

三

人道精神、忧患意识和悲剧风格共同构成韩愈传记的深层意象。这三者互相渗透，互有重叠，立体流动，有机结合，形成了完整的意象。韩愈传记的意象脱胎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受到特定文化体系的规范和制约，而它问世后又以独具的特征反作用于文化，补充、丰富和发展了文化，成为我国文化体系的新分子。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延伸。文化作为历史的沉淀物，广泛而又多层次地存在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尽管时代变换，韩愈传记的具象可能已经事过境迁，不易打动读者，但其意象包容的历史积淀，依然是构成人类或民族深层心理的重要因素，依然会在人们的意识或潜意识中发挥作用。因此，韩愈那些通过具象而巧妙地表达和传达出意象的传记佳作，具有让当时和后代读者心灵震颤的魅力。这，也许就是韩愈传记的生命力和艺术美的一大奥秘。推而广之，古今中外的文学巨著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和艺术美，其奥秘之一不也正是在此么？

应该强调，文学作品的表层具象和深层意象只能相对而言，不能绝对化、孤立化。作为作品有机整体的构成部分，涌动不息的情感奔流于其中，具象是情感化的具象，意象也同样情感化的意象，两者既有一定的独立性，又是互相依存和互相作用，而且会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仅有具象或仅有意象的作品，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力和艺术美。韩愈的一部分传记作品，特别是某些“谀墓”之文，尽管在形式结构，语言文字等方面花了苦功夫，可谓严整、精巧、凝炼，在一定程度上有具象美，但由于缺乏意象之美，就谈不上真正的生命力和艺术美。这类作品好似玩文字游戏，常被后代没出息的文人仿效，也遭到不少有识之士的严厉批评。韩愈传记留下的这一反面教训，在今天同样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注释：

① 韩愈：《韦公墓志铭》

② 何焯：《义门读书记》

③、④ 韩愈：《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⑤ 陶宗仪：《辍耕录》

⑥ 沈川：《史记会注考证》引斋藤正谦《拙堂文话》

⑦ 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

⑧、⑨ 韩愈：《登封县尉卢殷墓志》

⑩ 韩愈：《左司马李公墓志铭》

⑪ 韩愈：《清河张君墓志铭》

⑫ 参见杜维明《文化价值与社会变迁》，刊《读书》1985年第10期。